

视界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重建巴比塔

——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

生死迷局 传播学的「理论旅行」

回望先贤 玛丽·道格拉斯论污垢与危险

自由言说 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新闻自由

梦醒时分 纳粹暴行还会重演吗

吴飞 ◎ 著

THE TOWER OF BABEL
REBUILT

Wu Fei Expounding on
the Imagination of Communication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重建巴比塔

——
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

吴 飞 ◎ 著

THE TOWER OF BABEL REBUILT

Wu Fei Expounding on
the Imagination of Communication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建巴比塔: 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吴飞著.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638 - 2238 - 6

I. ①重… II. ①吴… III. ①传播媒介—关系—社会—研究
IV. ①G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3575 号

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

吴飞 著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 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 (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4 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238 - 6/G · 344

定 价 36.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视界》总序

出版人的使命和最大乐趣在于出版一些于社会进步、于人类福祉有意义的东西。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变迁，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学习方式在不断改变，尤其是当今媒体的网络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同时也相应地改变了读者接受知识和学术思考的方式。这意味着出版人要提供给大众有意义的阅读，一方面要坚持提供、筛选和传播更加具有内涵和深度的作品，完成对社会的担承；另一方面其表现方式要顺应人们阅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改变。为此，本丛书在坚持立足学术前沿高度的基础上，试图用一种更加清新生动的形式，在媒体网络化的多元传播表达中，寻求一种个性化的学术诠释，提供一种蕴含知识和精神内涵的深度阅读体验。

本丛书采用学术随笔形式，由专家通过浅近轻松的表达，娓娓道来专业话题，把学术思考与普适性的大众视野相融合。这种追求主要是基于几个层面的考虑和尝试。

1. 以轻松的笔触表达与读者的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当代传播学和市场营销领域学术研究的新取向和新追求，在信息由稀缺资源转而冗余的过程中，沟通方式甚至超越了沟通内容。传播价值的实现更加依赖于愉悦的传播氛围。书宛然就是作者心中清泉的流淌，从书中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人，看到人的音容笑貌，看到人用心在体会。读书就是与作者在对话中交流碰撞。我们所追求的是学术的愉悦而不是经院的枯燥，是趣味而不是浅薄。

2. 以趣味的叙述传递作者的睿智。学术思想原本就是对事件的认知归纳，所以在文章中适当穿插一些叙事性元素，不仅增加书的可读性，而且直接展示出对社会现实和生活本身的涉入。在传媒网络化的接受环境中，也许现场感比抽象的思辨更加富有说服力，因此在专业论述中体现出趣味、睿智、灵气，似乎更加符合读者对阅读体验轻松、感性、新颖的追求。

3. 以清新的文风体现学术的创新。改变以往学术研究冗长而又

艰涩的表述方式，摒弃经院式的旁征博引，提倡学者个性化的感悟和思想火花的迸发。其实这原本是一种颇有渊源的学术传统，人类辉煌的学术遗产中，很多都是深刻的叙述式感悟，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歌德《谈话录》，以及中国的《水经注》《诗品》《梦溪笔谈》《人间词话》等莫不如此。

丛书首批推出的四本著作是：《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与未来》《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营销的律动——卫军英谈营销传播》《艺术的信源——邹文谈艺术与传播》。邀请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学者撰稿，他们是在传播学学科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卓有建树的专家，其所做的很多研究都具有开拓性意义。这四本书从传播学到营销学，巧妙地完成了学术与市场结合的递延。无论是对传媒未来的洞察，还是对传播学想象力的延展；无论是对市场空间的节奏把握，还是对艺术传播的维度关照，都以其个性化的风格体现出学术的适应性。

《视界》丛书的问世是学术界和出版界携手为学术理想和出版信念的坚守，为在信息浮躁和尘嚣中独立学术精神的传播和远达而进行的创新努力。丛书从创意到出版的过程，充溢着双方信念相契、理想与共、坦诚沟通的精神愉悦和创作的快乐。我们深知，作者在丛书创意和创作中的付出其实就是源于学术信念和知识良知对于社会的一种无私奉献。在此，我们向作者的学术精神和慷慨付出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同时，本丛书的出版还获得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相关部门和领导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使我们得以践行对出版专业精神的坚持和对出版创新的探索，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我们希望以此为开端，向经济学、管理等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领域拓展。我们诚恳地邀请对此话题有兴趣的学界名流加盟，通过我们共同搭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思想你的思想，分享你的感悟，用你们的思想与睿智共建中国学术的巴比塔，共同创造和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您可通过邮件或微博的方式与我们联系或沟通。联系邮箱：yangling@263.net，新浪微博地平线阅读杨玲。

出版者

前 言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时，我选修了一门“人类学思想史”的博士生课程。有一次，因为主讲老师回家照顾要生孩子的妻子，而其他老师又没有时间，所以这是一堂没有老师在场的课。那天，户外的温度大约在零下20几度，在国内，一些学生们也许不会到教室了，他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的缺席辩护。但那天，在麦迪逊的那个课堂里，七个博士生没有一个人缺席，他们准时地来了，讨论与老师在场时一样热烈。

那天讨论的主题是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区隔》以及与之相关的几篇批评性的文章。同老师在场的时候一样，每一个学生都精心准备了他们的发言内容。有对著作核心话题的解读，也有对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甚至只是对著作中的某一个概念或者图表的疑问。大家相互交流看法，直到每一个问题大家都认为理解了或者至少达成了部分的共识，才会进行下一步的讨论。

比如大家对布尔迪厄的“field”这一概念吃不透，于是便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一个来自日本的女学生以日本的教育领域作为例子来解释，认为field就是像教育这样的专业性地方，与政治和经济相对独立，有自己的运行规则。另一个同学补充说，这个解释是对路的，在教育这个“场”中，会形成学生、教师和管理层这样层次比较分明的各种阶层。每一个人要熟悉这个场的“habitus”，都在这个场中寻找自己的位置(position)。在“场”中，人们要努力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从而追求在场中的有利位置。还有一个同学补充说，场就像一个游戏(game)，有自己独特的游戏规则(rules)，他翻开书中的一张图表说，其中“doxa”就是规则，而“habitus”就像是场中的基本环境和背景。我感觉他的理解有些问题，但一时又不知道如何解释。因为在我看来，“doxa”是布尔迪厄从胡塞尔那里借用来的一个概念，似乎指称的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与知识相对的，它应该不是场域中

的运行规则，虽然可能包括这一层面的东西，但不能对等。因为我知道，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doxa”多用来指称“意见”和“信念”，大体是指那种偶尔发现的一些见解。这种“意见”和“见解”往往是相对主观的，因此是与系统的“真学问”或者说“知识”（episteme）相对应的。后者往往是客观性、具有绝对真理意味的系统观念。不过，对这一概念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下课后，我好好查了一下，发现用的人还不少。

胡塞尔在其著作《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运用了“doxa”这一概念，他说：“自伽利略起，观念化了的自然就开始不知不觉地取代了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在几何的和自然科学的数学化中，在可能的、经验的、开放的无限性中，我们为生活世界（即在我们具体的世界生活中不断作为实际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世界）量体裁一件观念的衣服（ideenkleid），即所谓客观、科学的真理的衣服。就是说，通过一种能在每一个别情况中实际实行的并能被不断证明的方法，我们首先为生活世界的可具体地被直观的、形状的、实际的和可能的、感性的充实（sinnlichen füllen）构作量值指数，然后用这种方式获得预言直观地被给予的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的，现在还没有被实际地给予或不再被实际给予的事件的可能性。”

在胡塞尔看来，世界出现的所有问题和危机似乎都与这种观念化或观念的外衣相关。他认为，科学的危机实质上乃是哲学的危机，这种危机根本就是人的危机，他写道：“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为什么是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呢？胡塞尔认为，欧洲的人性就是理性，真正欧洲人的人性就是对理性的信仰。早在古希腊，episteme（纯科学）是与 doxa（意见）相对立的，episteme 作为一种典范，赋予一切事物以价值、目的和最终意义，这就在最初为欧洲人观看世界设立了一张蓝图，以后通过柏拉图的理型论更固定了这一蓝图，并且成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从而造成对具体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遗忘。

康德使用这一概念时，含义差不多。他认为，我们的整个认识都是从两个源泉中得到汲取的，一方面是经验，另一方面是理性。因此，所有确定性也都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经验确定性，另一种是理性的确

定性。“理性确定性或是数学确定性，或是哲学确定性。前者是直观的确定性，后者是推理的确定性”。“只要我是出于本己的经验而对某物感到确定，那么这种经验确定性就是一种原本的确定性；只要我是出于他人的经验而对某事感到确定，那么这种经验确定性就是一种派生的确定性。后者又通常称为历史确定性”（I. Kant, 1983: 495）。

陈嘉映认为，episteme 是带有 logos 的真 doxa，episteme 是由 logos 展示为真的 doxa。他强调“episteme 通常译作知识、科学等”，更强调“在本文中我更多译作真知”。那么什么是真知呢？陈嘉映的定义是：“真知是带有论证的〔真〕看法。”他认为：“真知之为真通常不等于符合论意义上的正确，我们更多在明理的意义说到真知——真正的、深入的理解。”他还解释说：“单从汉语说，论证可以视作较为正式的说理——论证，基本意思在于为看法给出理由，提供理据。提供理据，与争论有关，论证总是针对或显或隐的反对意见，反对意见可以来自他人，也可以来自自己心中的怀疑。理由、理据可以是事实方面的，也可以是比较纯粹的道理方面的。”

梁康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说，“学术”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episteme 较为相似。在《形而上学》的中译本中，吴寿彭便将它译作“学术”，而苗力田将它译作“科学”（参见《形而上学》，982b）。当亚里士多德说“哲学的智慧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时，他是把哲学这种学术看作是一种静观的知识，即不具有功利性质的知识。因此他写道：“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自属确当。因为理论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而实用知识之目的则在其功用。”（《形而上学》，993b）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学”与“术”是有区别的，甚至是对立的。他所说的 episteme 概念更应当是指“学问”而非“学术”。

三个小时的时间，就像老师在场一样，每一个学生积极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时他们会就一些不同的看法交换意见，如来自台湾的学生 Lillian 在她的报告中说，布尔迪厄与马克思的观点很类似。对此，日本的留学生 Yuki Kashima 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说：“你说他们类似，但我认为他们有很大的不同，我个人的观点是，马克思特别强调斗争，很强烈，但布尔迪厄不是这样。”对此，Lillian 解释说：“其实我是指他是在马克思文化理论上的发展，因为他不仅承认经济的作用，还延伸到了性别、性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在讨论

时，大家随时会翻到书的某一页说，你看，在书里布尔迪厄是这样说的，如此等等。显然同学们基本上都相当认真地读过这些著作。一位叫 Joson Hopper 的同学在他的书上画满了各种符号，他摇着头说：“读布尔迪厄的著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他的写作风格和组织都相当难，想弄清楚他的思想并不容易。”不过，他又补充说：“不过，我发现读他的著作还是很有趣的，尤其将他的思想与我们新近学习的 Goffman, Latour 和 Foucault 比较起来的时候。”

事实上，就我听的感觉，这些博士生所提的问题并不见得有多深奥，他们的问题问得都很小，有时甚至觉得有些太小儿科了。相反，国内的学生们喜欢问很大的问题，有时提一个问题需要用很长时间去表达。有一次，一个学生对我讲：“吴老师，其实我对……问题真不明白，但那个问题好像对别人来说很容易，所以不好意思问，怕人家笑话我，我现在问你可以吗？”其实，在我看来，问题问得细些、小些甚至浅些，有什么关系，如果真是自己不懂的，为什么不好意思问呢？学术的进步，本来就是一小步一小步前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是欣赏这些博士生的态度的。

这可以说是我听这一堂博士生课的意外收获吧。

这本书的写作，我设想的是一场虚拟的、类似于那场博士课堂上的学术对话，我希望通过这本书与同好们一起欣赏大师们的智慧，并就传播与社会方面的问题，进行一场深入的交流。

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杨玲老师，没有她的督促，我不会下决心利用假期的一点一滴时间整理出这本著作；感谢邵培仁教授、卫军英教授，这套丛书的许多想法是我们三个人在西溪湿地散步时头脑风暴时的副产品；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的邀请，本书中部分内容，是我在美国与潘忠党教授和郭建斌教授讨论后的感想；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时代周报》的编辑们，本书中的部分文字在这些报刊上发表过；感谢我的夫人杨建娟女士，她在我写作本书时，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无怨无悔地担当起了培养孩子的重任，她还通读了全部文稿，修改了几处错误；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薛捷，他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使本书的质量得以保证。

目 录

CONTENTS /

前 言 / 1

第一篇

生死迷局

- 1 传播学的“理论旅行” / 3
- 2 社会因沟通而存在 / 14
- 3 传播学的死与生 / 31
- 4 实践感与真问题 / 43
- 5 回到芝加哥学派? / 46
- 6 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 / 53
- 7 传播学范式的革命 / 64

第二篇

回望先贤

- 1 杜威的共同体的梦想 / 71
- 2 戈夫曼的戏剧、仪式和游戏观 / 79
- 3 玛丽·道格拉斯论污垢与危险 / 87
- 4 默顿和他的“中层理论” / 96
- 5 西德尼·明茨的权力观 / 103
- 6 齐泽克的“幻想” / 112
- 7 凯博文的“苦难”追问 / 119
- 8 布尔迪厄的“区隔” / 125

第三篇

自由言说

- 1 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新闻自由 / 137
- 2 美国表达自由思想的来源 / 141
- 3 法国百年表达自由之路 / 149
- 4 中国古代的禁言与抗争 / 160
- 5 消息来源的保护 / 169
- 6 虚拟世界也要建设公序良俗 / 175
- 7 含糊的“第四权力”之说 / 181

第四篇

梦醒时分

- 1 新闻是寻“根”的事业 / 193
- 2 风险社会与媒体报道 / 198
- 3 中国梦与身份认同 / 206
- 4 纳粹暴行还会重演吗 / 217
- 5 相煎何太急 / 228
- 6 新话、双重思想与篡改历史 / 236
- 7 社会标签与社会偏见 / 243
- 8 互联网政治 / 252
- 9 终结谣言？可能与不可能 / 258

参考文献 / 266

第一篇

生死迷局

传播 (communication) 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我们可以将研究人类最深不可测而又充满无限魅力的沟通交流行为与艺术的“传播学”视为一整套蔚为大观的知识，也可以视其为一系列科学化的实践。无论是书店、图书馆里标示为“传播学”的书，还是那些被分类为“传播学”的杂志文章，你多少会有些无所适从，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内容，甚至有人认为，传播学是人类追求一种共同体生活最核心的科学。

但可观的是，传播学家们不停地借用、挪用，诸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他们吸收、消化、利用、拓展这些知识，来建构宏大的传播学理论大厦，但从传播学创立至今，传播学者从未在“传播学是什么？何所为？”诸如此类的原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而这也许正是传播学的迷人之处吧。

这是一次历史之旅，我们要穿越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从大西洋彼岸来到中原；这是一次学术之旅，我们将沿着传播学的发端走向未来；这是一次“理论旅行”，我们要观察传播学在中国本土化实践。

2013年10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变革中的新闻与传播：实践探索与理论构建”学术研讨会开幕。会议期间，笔者与深圳大学的吴予敏教授有过一次长谈。我们有一个相同的看法：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虽然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取得不少成就，但却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这可能与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受到美国的影响有关。

一、“理论的旅行”

1983年，爱德华·萨义德在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中的《旅行中的理论》一文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旅行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最早见于1982年出版的《拉里坦季刊》(Raritan Quarterly)，后收入萨义德的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萨义德认为，各种观念和理论会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他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理论为例，演绎了观念或理论在从甲地到乙地或甲文化到乙文化的旅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他认为，文化和智识生活通常就是由观念的这种流通(circulation)所滋养，往往也是由此得到维系的，而且，无论流通所采用的形式是世所公认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影响、创造性借用，还是大规模的挪用形式，观念和理论由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既是活生生的事实，又是使智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个不无用途的条件。“理论的旅行”势必要涉及不同于源点(point of origin)

的表征和体制化过程。而这就复杂化了对于理论和观念的移植 (transplantation)、传递 (transference)、流通 (circulation) 和交流 (commerce) 所做的任何解释。换言之, 理论的旅行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一是需要有一个源点或者类似源点的东西, 即观念赖以在其中生发并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发轫的境况; 二是各种外在压力促使理论跨越一段横向距离 (distance transverse), 穿过形形色色语境压力路途, 寻找到新的栖息地; 三是新环境接纳吸收或抵制长途迁徙来的理论; 四是适应新的时空环境中激烈的生存竞争, 理论全部 (或者部分) 得到容纳 (或者融合) 后, 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由其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传播学从西方走来, 我们对它的吸收、改造都是正常的情况, 但既然我们还称之为“传播学”, 那么它的“芯”是否也需要被再造升级呢?

在《旅行中的理论》发表 10 年之后, 萨义德又发表了《旅行中的理论再思考》一文。在这两篇文章里, 萨义德分别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旅行理论模式。以卢卡奇理论的两条传播路线为例, 萨义德指出: ①旅行理论不仅持续地诠释、回归原创理论, 而且也可能锲而不舍地否定、超越权威理论; ②旅行理论涉及时间、空间、文化、政治等边界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两个边界问题是跨越学院界线和跨越欧洲地理、文化、政治空间界线, 前者是批评理论不竭的力量源泉, 后者是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底线; ③旅行理论并非无尽的后现代游牧式的理论漂泊迁徙, 通过勘测理论迁徙的地貌, 我们不仅触及理论的空间演变轨迹及其涉及的借鉴、适应、转换、比较、排斥等中间环节, 而且触摸到同源、同族理论共享的批评意识或曰连接构建的思想和道德共同体; ④西方空间的旅行理论与跨越西方空间疆界的旅行后殖民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中国传播学发展简史

下面我将带着大家看看发端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的中国之旅。

一般认为, 传播学引入中国内地分为两次: 一次是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当时曾经在内部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材料, 翻译了一些西方传播学论著的片断, 知悉者只限于极少的几个大学新闻系的教师。第二次引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1977 年, 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访问香港中文大学, 提出要发掘中国文化中

的传播学遗产。一年后，在其弟子余也鲁的努力下，香港和台湾两地，分别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念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与会者就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找出了“12个探索的入口”，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探索由此拉开了序幕。1978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革”后的第一个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当时将这个词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后来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1978年10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介绍了传播学。10月1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给当时80多位第一届新闻研究生做学术报告。但是给他配的翻译由于对专业词句的陌生，无法翻译“大众传播”一词。后来他用英语讲话，在黑板上写出“Mass Communication”。

1981年《新闻大学》创刊伊始即刊载陈韵昭等人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论文和译作，如第1期首刊陈韵昭的《传学浅谈》，第2期发表了陈韵昭的《传与传播》，第5期载有陈韵昭的《传的周折》，第6期载有陈韵昭摘译的《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第9期刊登了陈韵昭的《欧美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特点和发展趋势》。1978年9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1981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通过答辩。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国际新闻界》（季刊）第2期至第4期连载了由张隆栋编译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

1982年4月，时年75岁的“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教授（时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顾问）在余也鲁教授的陪同下来华，并在华南师范大学作了为期7天的教育传播学学术报告，全国电教界同行参加。施拉姆随后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人民日报社以及复旦大学等单位。施拉姆

在华访问讲学期间，提出了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他向中国的学者们描绘传播的前景时说：“在未来 100 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的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科学见面的基础。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右二为施拉姆

1982 年 11 月 23 日—26 日，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倡议下，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6 所高等院校的新闻系与少数新闻单位的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工作者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座谈会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并建议要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的、有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

1982 年，《新闻学会通讯》第 14 期发表了施拉姆（宣伟伯）在